

什么样的城市宜居

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城市中的人们在立交桥和摩天大楼组成的水泥森林中打拼。拥挤的人潮、喧嚣的路面、越来越少的绿地让人们反思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？怎样的城市才是宜居的？

今天的城市，城市化面积远远超过了城市化水平。城市的天际线越来越壮观，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，其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？一百年后，人们将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发展？

归根到底，城市是人生活的地方，这决定了城市最基

本、最重要的功能是让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都能够过上健康、安全、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宜居的城市应该有清洁的市容、优美的环境、便捷的交通、方便的市政和服务设施，以及能够提供普通市民住得起的房屋等等，这是城市建设的最基本要求。

人类到底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还需要时间的检验，重要的是，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给出正确答案以前，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。

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上，我们的城市到底该怎样来规划、设计，才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舒适、便利并进而产生幸福感？本报约请了几位专家，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。

城市规划面临核心价值的转变

■本报记者 洪蔚

刚刚结束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。

《人，诗意地安居》是一部生态文明经典著作，“诗意地安居”是海德格尔提出的重要理念。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，人们越来越多地“安居”在城市，当今的城市真的满足了人们“诗意”的需求了吗？

为此，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采访了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。在他看来，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，正面临着核心价值的转变。

向生态文明“转身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曾在谈到我国城市规划的未来时强调：我国未来10年城市规划的重点应该有所转变——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。请您解释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转变？

杨保军：规划工作重点的转变，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决定的，也是以往暴露出来的问题，给我们提出的要求。在进行城市规划过程中，要考虑并解决很多问题，在不同的国家、社会，不同的发展阶段，对问题的排序是不同的。

在改革开放前，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物质极度短缺的时代，因此社会对“物”的渴望很强烈。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，我们跟很多欠发达国家一样，如何更有效地创造财富，在规划工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，排在首位。因此，以往的几十年，我国的规划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崇拜效率、GDP的特征。

这种“以物为本”的理念，以往没有遭到太多的反对。如今人们开始思考“经济发达了，我的生活质量，我的生活感受是否也提升了呢？”在这种反思面前，人们发现经济的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升，两者并没有很好地对应起来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应有的关注。

可以说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——从更关注“物”的工业文明，向更关注“人”的生态文明的转变。刚刚结束的十八大，也再次强调了这种转变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在城市规划上该如何体现？标志是什么？

杨保军：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，从根本上说，是社会核心价值的转变。以这种价值转变，反观我们以往的规划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以道路为例，我们以往在道路的规划上，体现的就是物的思想。

首先道路非常宽阔，其最大受益者是汽车，可以使它快速通行，而过于宽阔的道路，给步行者的通行带来不便。通常道路要满足三类通行：

汽车、自行车、行人，汽车是“物”，为了更快地创造财富，本来就狭窄的自行车道，还让出了一块供汽车使用。“人”的空间被挤压了，可供步行的街道，正逐渐消失。

现在西方倡导一种理念：可步行的城市，也就是说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，应该有足够的空间供行人穿行，而且是悠然自得、饶有兴趣地穿行。

尊重规律 尊重自然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认为城市规划主要应遵循哪些原则？科学？美学？如何相互作用？

杨保军：城市规划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还不是一门科学，它不具有可重复性，但它具有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，其中一些规律是必须遵守的，自然规律、经济规律、社会规律最为关键。

前段时间，在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中，一些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，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在建设中违背了自然规律，在自然条件不适当地方进行了建设。

再来看经济规律。以鄂尔多斯为例，这个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，大规模的建设量游离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之外，是一次“资本游戏”，因此经不起经济规律的考验，走向危机是迟早的事。

从社会规律看，目前我国正处在必须反思社会公平的阶段。城市规划不仅要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，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。兼顾社会公平，也是十八大关注的问题之一。

城市规划在科学性、合理性的问题解决后，才考虑到美学。我认为，城市的规划者和建设者要有艺术家的情怀，而真正的艺术家最懂得尊重自然。规划艺术也是在自然、文化、功能三者间寻求平衡的艺术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您认为目前中国城市规划存在哪些问题？

杨保军：国际比较是一个很慎重的课题，所谓比较要有一定的相似条件。城市规划与自然科学不同，涉及众多制度和文化的因素。因此，我这里所说的更多的是“差异”，而不是“差距”。

西方国家早已度过了工业文明阶段，城市化已经达到了70%-80%以上，不再面临大量的农民向市民转变。环境问题在西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，因此，在城市规划中对环境保护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，西方的重视程度也高于我国。

此外，西方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稳态、空间形态基本定型。西方的城市规划不以“增量”为主，而是以“存量”为主，很少有大规模的新建项目，而是更多地对已有的城区进行优化、



杨保军

更新、改善。

东西方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差异，更主张民主的西方国家，在城市规划上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意愿，在确定一个规划方案前，必须和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、对话，往往一个小项目要谈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。

这些差异导致我国在进行城市规划时，与西方国家的关注重点和方法都不太相同。

目前，我们逐渐遇到和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问题，比如环境保护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。在公众参与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关注上，越来越多地有了参与的诉求，以往完全由政治精英、技术精英、企业精英进行决策的模式，也正面临着改变。

固化的文化梦想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以北京为例，不少建筑、景观缺乏审美价值或与周围景观不协调，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？

杨保军：一位法国建筑大师说过：“让我看看你的城市，我就知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追求着什么。”城市代表了一代人在一个地方的梦想和追求，一种价值判断，建筑风格不协调，说明了社会内部价值观存在一种不协调。

从审美上说，我们的社会在现阶段，的确比较浮躁，沉不下心来表达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美，只是用“形式之美”来追求对形式的追求，又往往被简单地表现为对“前卫”“时髦”的膜拜。

“为什么建筑不能赶时髦？”是前段时间在规划界、建筑界争议颇多的话题之一。我个人

以人为本：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

■本报实习生 韩天琪

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的探索阶段。城市规划领域也在这一历史潮流中提出了“以人为本”的规划理念。这一理念将对我国未来的城市规划产生哪些影响？它如何与我国的制度改革、城市化进程和建设和谐社会结合起来？

带着这些疑问，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中国城市规划要从“以物为本”向“以人为本”转变，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？什么是“以人为本”的规划理念？

叶裕民：这一说法高度概括了中国城市规划当前转型发展的方向和目标，即从以前的物质规划、技术规划转向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。

一个城市“人的需要”首先表现为公共利益的需求。新时期规划要从原来的经济增长导向向公共利益导向转型，把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、整体利益放在首位，在规划中为各阶层参与并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提供空间载体和路径。特别是在规划中关注低收入阶层、外来农民工阶层利益上升的通道。

具体而言，“人的需要”首先是指人的社会性需要，比如人的住房要求。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得到了就业岗位，但居住需求没有得到解决。以物质和技术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增加了工厂用地、商业用地、政府管理用地和当地户籍人口的居住需求用地，而忽视了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社会性需要，导致了大量的农村非法建筑问题和城中村问题，也是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无定所的重要原因。

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还体现在对生活性物质空间和人的生活品质的关注中。在物质规划理念的导向下，以前的规划服从于经济发展需要，较多地关注经济基础设施，较少关注生活性基础设施，包括教育设施、公共医疗设施、体育设施、文化设施等。大部分基础设施规划与管理是按照户籍人口数量规划的，没有考虑新增流动人口的需求，由此带来大部分城市生活性基础设施短缺和过度拥挤，降低了居民生活质量。



叶裕民

以人为本的规划要求照顾到城乡全体居民发展的诉求。2007年《城乡规划法》出台，已经将中国规划广泛而普遍地由城市向乡村延伸，但是，总体看来，目前的乡村规划大部分是“微型城市规划”，缺乏根据乡村特点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总体安排，特别是普遍的就乡村论乡村，如何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框架下去谋求农村现代化，谋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福利的增加，还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和关注的最大课题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觉得在城市的规划、设计、建造中，科学原则、美学原则和以人为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叶裕民：在城市规划发展的过程中，科学、美学和以人为本的原则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其中，以人为本是最根本的原则，它包含了科学原则和美学原则。“以人为本”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，本身具有其科学性。

城市规划领域的科学原则在经典的《雅典宪章》中得到完美体现，它根据当时杂乱无章的发展格局提出城市规划的目的，把城市清晰地划分为不同功能的区域。

从功能分区的角度看，《雅典宪章》具有历史进步性。但是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大城市的经济发展重心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，这些产业低碳、绿色，与居住功能的冲突性减弱。为了提高生活质量，城市规划越来越超越《雅典宪章》，走向职住平衡的紧凑规划。关注生态环境，关注历史遗产保护，关注住房与居民生活质量，关注大批新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发展的需要，这就是《马丘比丘宪章》的进步。同样以人为本，在不同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时代，规划方案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以人为本却是规划不变的追求。

可以说，城市规划领域的科学原则是与时俱进的。经济的发展，产业结构的演进，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，都要要求城市规划有不同的空间安排，这完全取决于因地制宜的科学性。所以科学原则和以人为本具有一致性。

关于美学原则，在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史上，19世纪曾经有过一场起源于芝加哥的“城市美化运动”，这一运动后来风靡西方国家。很多城市为了“美化”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投向广场和绿化项目，使得政府财政难以继。同时大型项目反而降低了市民生活的便捷性。这说明单纯追求所谓“美”是不适宜的，对“美”的追求要与人的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契合。

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美不是单独美学意义上的美，而是与人的尺度和人的需求相适配的美，并且要将“自然之美”与“社会公正之美”及“历史文化之大美”相结合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它们是这座城市的记忆、骄傲和独特的凝聚力。所以在城市规划时要把这种文化理念充分挖掘出来，这是城市规划美学应该贯穿的基本特征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城市规划应该怎样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？

叶裕民：我国目前城市规划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反映新增城市人口的需要。城市化发展的核心是两个转化：一是通过空间流动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；二是通过社会流动实现城市边缘人群向社会中间阶层的转化，最终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。改革开放30

城市景观：让我们更接近美好生活

■本报记者 郭勉愈 实习生 索菲

今天，中国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，城市建筑也从以前的偏重实用向着实用与美观、生态、环保并重的方向发展。如何打造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？国外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方面？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与法国尼姆美术学院兼职教师、法国 DPLG 注册设计师安建国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与法国相比，您觉得当前中国的城市设计与建筑存在哪些问题？

安建国：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，导致诸多问题脱节，社会问题不断堆积。尤其是表面工作做得很多，为后期的全方位梳理留下巨大的工作量。

法国在上世纪50-60年代也有城市化发展过快的问题，二战结束后，法国大力发展建设，吸纳很多外国劳工，急于处理大城市人口膨胀问题，大量的劣质房地产开发，无限度地拓宽马路等。上世纪70-80年代大量的人口流动造成很多资源浪费，法国的城市化进程放缓，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城市应有的生活方式。上世纪80年代后，法国的城市改造大多是在改建或弥补上世纪50-60年代的建设失误。在上世纪90年代后，法国才真正进入生态城市和花园城市的建设阶段。

以城市景观设计为例，中国的景观设计80%以房地产景观开发为主，景观在这一领域变成了房地产造园设计。在中国，这种设计项目的严重失衡会导致很多后续问题，如景观学科发展残缺，国际景观理论与中国的景观实践脱节等。法国的房地产开发90%以上由政府来做，对土地的使用有非常合理的论证程序。

中国城市景观设计与建筑需要在城市的生活尺度上深入研究，需要对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深入研究，需要对城市的自然和生态形式进行深入研究，这些研究的基点都是社会共同的利益——更接近美好生活！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如何定义城市景观设计？

安建国：景观是以土地为依托，以时间为脉络，以自然自我管理为特征，以使用者的体验为论证依据的现代科学，它构建着一切生命的和谐共存关系。时间伴随着景观的形成，景观设计师设计着不同时间段的生态演化过程。一个场所有四季的变化，有时间的渐进，景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树木在长高，植被在增多，河道有干涸的时段等等，这些真实的生活需要设计师去设计思考。

对自然的理解是一个景观设计师的基本素质，景观设计提供了世界万物在时间和空间上自然发展的可能。只有了解自然，才能驾驭自然，才能引导自然自我管理，才能让人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。

现代景观已由花园尺度进入星球尺度，由小尺度的私密空间进入巨大尺度的公共空间，它的服务对象发生巨大变化，它关照的已经不仅是人，还有与人类一样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万物，它构建着一切生命的和谐共存关系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以北京为例，有些建筑、景观缺乏审美价值，或者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，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？

安建国：景观不可用简单的美来评判其价值，“美”只是景观所表现出的一种面孔，景观所呈现出的不可见性更具魅力，如当你在海滩沙地光脚散步时，你脚下的感觉和海风拂面的畅快是不需要睁眼体会的。

一个环境的协调与否是一个设计师对场地理解的基本素质，我不认为中国的设计师真的差到连环境的协调都控制不了！大多是因为设计师不在决策的位置上，有时甚至没有与甲方平等的沟通交流机会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觉得一座城市的建设、规划、设计，应遵循哪些原则？

安建国：这个原则就是“和谐”，是一切生命的和谐共存！是对万物的呵护与尊重！不可用人类中心论（以人为本）的狭隘思想理解景观的博大。景观需要自然科学、空间科学和艺术科学的交融才能结出硕果！

目前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现状很不乐观，巨大的城市导致交通不便，城市压力大，污染高。我想中国需要思考适宜的城市尺度和模式。中国推出很多时髦词汇，如：国际化大都市、生态城市、花园城市、田园城市等。这些词到底有多大意义？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冷静地讨论一下什么条件可以叫田园城市？至少让设计师知道一个有具体数据的建设标准，而不是一个空降的口号！我们喊的口号够多了！

我认为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，有一些基本事项要首先关注解决：第一，要设计保留城市扩张过程中与乡村交界的绿地，这些绿地可能成为新的城市绿肺；第二，城市不要无限膨胀成一个集合体，关注各个城市辖区交界处的功能潜力开发；第三，由于人口众多，要加强垃圾分类管理，减少污染；第四，避免为汽车建城市，要为人建城市；第五，认真做好基础设施建设，不可再造形象工程；第六，提高公共空间的多功能使用率；第七，尽可能地增加绿化面积，包括建筑立面和屋顶；第八，设计项目一定要充分论证后再进行实施；第九，协调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部门工作，避免施工时各自为政，浪费人力物力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城市规划中，是否存在非科学性决策影响规划的现象？

叶裕民：现在城市规划中的非科学性决策肯定是有，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是当前城市运行的机制当中，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尚未完全转移到“以人为本”上来，还是较多地关注经济增长、少数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城市物质工程。“政绩工程”必然导致不能从整体上对城市进行规划，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和人的很多方面的需求得不到关注，由此造成规划决策的非科学性。

影响城市规划决策科学性的另一个因素来自规划师自身。城市规划师是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精英分子，他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追求。但我们的城市规划大部分是由建筑学背景的规划师来设计，这种工学背景使得他们对物质规划和技术规划得心应手，但由于缺少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知识结构，他们并不能完全透彻地理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人的需求，很多规划师空有“以人为本”的价值追求，但是却缺乏“以人为本”规划的能力，使得很多规划方案没能深刻体现“人”的需要。